

Dongya Shijie
Xingchengshi lun

东亚世界 形成史论

韩 昇 著

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首先是由其多民族性特点而产生，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加深。民族融合的传统和扩大文化影响的态度，使得中国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基本点不在于民族的征服，而是注重包容、交流、同化和融合。这与罗马帝国通过民族征服来构建世界帝国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韩 昇 著

东亚世界 形成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韩昇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309-06510-7

I. 东… II. 韩… III. 东亚-历史-研究 IV. K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2838号

东亚世界形成史论

韩 昇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95 千
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 100

书 号 ISBN 978-7-309-06510-7/K·250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编 总 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3

第一节 对外关系理论形成的基础 3

第二节 “华夏”意识和“夷狄”观念的形成 5

第三节 “大一统”理论与天下秩序 16

第二章 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 26

第一节 建构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26

第二节 册封、羁縻与朝贡 31

第三节 征伐与和亲 44

第三章 东亚世界的基本特点与移民的文化传播 53

第一节 东亚世界的基本特点 53

第二节 移民与文化传播 70

下编 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 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 89

第一节 4 世纪以前的东亚 89

第二节 高句丽与南北朝关系的演变 94

第三节 百济与南北朝关系的演变 97

第四节 倭国与南朝关系的演变 103

第五章 南朝文化向东亚的传播 107

第一节 南朝向百济的文化传播 107

第二节 百济向倭国的文化传播	117
第六章 倭国与江南	121
第一节 倭与江南“吴国”	121
第二节 倭国与“吴国”的交往	125
第三节 “吴国”所在	129
第四节 “吴国”文物	135
第五节 “吴国”移民及其事迹	140
第七章 大陆移民与佛教传播日本	149
第一节 钦明十三年佛教“公传”说批判	149
第二节 钦明朝以前的佛教遗迹	156
第三节 大陆移民与佛教勃兴	161
第八章 隋朝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与高句丽问题	175
第一节 隋朝重建国际关系秩序所面临的问题	175
第二节 高保宁事件及其影响	177
第三节 契丹与靺鞨	181
第四节 隋征高句丽	185
第九章 隋朝与倭国关系的重建	193
第一节 突然到来的倭国使节	193
第二节 遣隋使的使命	196
第三节 东亚的“佛教外交”	201
第四节 国书与倭王号	205
第十章 东亚局势与唐朝的朝鲜政策	210
第一节 唐朝对外政策的基础	210
第二节 唐高祖时代的朝鲜政策	212
第三节 贞观十九年以前东亚局势的演变和唐太宗的朝鲜政策	216
第四节 唐朝征伐高句丽的各种因素	225
第五节 贞观末年至高宗时代的东亚形势与朝鲜政策	228
第十一章 东亚大博弈——白江之战	237
第一节 唐高宗朝的朝鲜战略	237
第二节 新罗的战略考虑	245

第三节	日本争夺朝鲜南部的战略利益	250
第十二章	东亚世界格局的形成	263
第一节	东亚世界国家格局的形成——新罗统一朝鲜	263
第二节	新罗统一的外部原因与唐朝的战略目标	272
第三节	东亚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日本全面接受唐文化	276
第四节	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280
第十三章	日本的唐朝移民	283
第一节	来自唐朝的移民	283
第二节	袁晋卿家族	289
第三节	唐朝移民的境况	294
第四节	中国与朝鲜移民身份地位的比较	297
第十四章	大陆移民对日本社会的主要贡献	305
第一节	政治影响	305
第二节	军事力量	311
第三节	外交活动	315
第四节	制度建设	324
第五节	文教艺术	334
主要征引文献		343
后记		356

上编 总 论

土 象 总 介

第一章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对外关系理论形成的基础

中国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研究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理论,首先就必须对中国国家形成的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深入而准确的把握。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即是各部族之间融合的过程。根据古史的记载,居于中部地区的炎帝族曾经同黄帝族在阪泉发生三次冲突,黄帝族战胜炎帝族进入中原,然而,其结果却是黄帝族与炎帝族的融合;炎帝族和黄帝族的联合,战胜了自南方北上的九黎族,结果是北方部族与南方部族的融合。远古国家形成的传说,都显示出中国的特点,也就是早期国家是通过民族的融合而形成的,这个融合过程伴随着激烈的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并不是胜利部族对失败部族的征服和奴役,而是归于融合。这是中国国家形成史上的一个重要传统,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周战胜殷(商),却分封殷人,形成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周朝。

由此可知,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国家,在此过程中,更受重视的是民族的融合而不是征服。这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强调对不同民族(部族)的怀柔,而不是奴役。这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第一个基础,它是由多民族国家及其形成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其次,随着国家的建立,出现了居于中心地位的民族,其周围分布着各种民族,南方的民族被统称作“蛮”,东方的民族被统称作“夷”,北方的民族被统称作“狄”,西方的民族被统称作“戎”。由此称呼可以看出,早期国家无时无刻不同周边民族发生关系,在与他们的战和关系中逐步扩大国家疆域。在此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各个部族在国家扩大的过程中逐渐消失了,他们并不是被灭绝,而是融

为中国主体民族,国家正是随着这些民族的加入而得到扩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多民族融合的过程,基本上是周边向中心的融合,这个中心沿着黄河一线分布。尽管中国的文明是多起源的,例如南方长江下游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文明发源地,良渚古城也证明这里是远古国家所在地,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北方显然居于优势地位。这个现象可以从地理学上得到解释。古代文明起源于黄土地带,松软易于开垦的黄土地,尤其有利于使用石器时代的粗陋工具进行开发,这就使得分布于黄土地带的古文明得到迅速发展,压倒其他地区。居于优势的文明无论在生产生活方式、国家制度、社会成熟与文化发达程度方面都明显高于周边民族,因而形成一种吸引力,促使周边民族向它靠拢看齐,从而形成文化的优势,并以此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吸收同化周边民族。

中国古代特别注重通过建立文化优势来处理同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孔子提出一个著名的原则:“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①用文化优势来吸引和改造周边民族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第二个基础。

建立于先进地区的古代国家,形成一套伦理道德与行为准则,在相同国家制度和道德规范下,中心区域形成共同的文化基础,造成相同的民族心理,这既是中国统一的文化要素,也是国家在与周边民族国家相比较时,形成民族认同与共同的对外思想观念,由此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

因此,在多民族并存的状态下,判别属于中国与否的标准,是以生产、生活和道德、礼仪所构成的文化为依归的。也就是说,判定是否属于中国的标准,主要不是根据种族的血统的原则,而是根据文化的原则。接受并融入主流文化,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违背主流文化,便属于异族。文化的标准,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与扩大的特点,也是古代对外关系理论的第三个基础。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远在夏、商、周三代,汉族就与周边不同民族频繁接触,并在共同的生产斗争中,相互影响,彼此交融,从而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和种族因素。由于汉族较为发达的生产方式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带动其他民族的发展,促使他们不断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秦国和南方的吴国、越国,在中原国家的帮助下实

^① 《论语·季氏》。

现文化上的改变,从而被中原诸侯所承认和接纳的历史,就是生动的事例。

因此,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首先是由其多民族性特点而产生,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加深。其次,对其他民族的认识,是从文化习俗的对比而形成的。第三,民族融合的传统和扩大文化影响的态度,使得中国对周边民族关系的基本点不在于民族的征服,而是注重包容、交流、同化和融合,这与罗马帝国通过民族征服来构建世界帝国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第四,中国统一王朝建立之后,其实行的对外政策是在以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指出这一传统至关重要。

第二节 “华夏”意识和“夷狄”观念的形成

一、“夏”、“诸夏”与“华”、“诸华”

中国最初的国家是夏,这从大量的考古发掘和众多专家的研究^①,可以得到证实。

如果说夏王朝是中原文化的代表,那么,我们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青莲岗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迹,可以发现南方文明的起源。约四千年前的良渚古城,面积达二百九十万平方米,表明南方史前文明在此时期已经走向成熟。

由此而言,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还是多元文明起源的国家。这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夏”的含义 中原民族称为“夏”,源于中国最早的国家夏王朝。《尚书》记载,舜对东夷族首领皋陶说:

蚩夷猾夏,寇贼奸宄。((《舜典》))

意思是说:蛮族和夷族侵犯我们“夏”国,杀人抢掠,造成内忧外患。东汉大儒郑玄注称:“猾夏,侵犯中国也。”直接把“夏”等同中国。这并不是郑玄的新见,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也说:“夏,中国之人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进一步作解释,认为

^① 《夏商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安金槐《豫西夏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等。

“夏”是同蛮夷等周边民族相区别的称呼。

那么,“夏”源于何处呢?有不同的见解,或以为源于湖北的夏水,或以为源于山西的“大夏”地域。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夏”有“大”的含义,《诗·秦风·权舆》歌唱道:“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馀。”“夏屋”就是“大屋”。《尔雅·释诂上》就说:“夏,大也。”汉扬雄《方言》卷一说:“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可知秦晋之间自古称赞宏伟者为“夏”。那么,最初建立的王朝称“夏”就容易理解了。《尚书·武成》“华夏蛮貊”之《孔传》称:“大国曰夏”,可以作为佐证。

而且,“夏”还有华彩的含义,郑玄在注释《周礼·天官·染人》“秋染夏”时说:“染夏者,染五色。”这与下面将要讨论的“华”字相同,《左传》“定公十年”条之“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一句,孔颖达《正义》解释道:“夏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彩的含义,使得“华”和“夏”都被赋予文化的含义,在儒家看来,衣冠乃礼仪之表,有礼乃大,故华夏对蛮夷在文化上居于优势,是区别两者的根本依据,这一点颇为重要。

“夏”的辖区变化 相传商的始祖契和周的始祖后稷原来都出仕舜,舜禅让于禹,禹之后的启废除禅让制度,建立夏朝。所以,商和周的祖先都为夏臣,商为东方部族,周为西方部族,皆源出于夏。所以,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周人以夏的继承者自居,以表明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正统地位。《尚书·康诰》记载,周灭商后,建洛都,周公代成王对臣下训示道: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周发源于西部的陕西地区,故称其地为“西土”;洛邑在东,故称“东土”。文中的“夏”指周的直辖地,周与“一二邦”共同治理“西土”。由此可知,在周初,“夏”仅用来指称周王朝直辖领域。

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诸夏”的说法。《左传》“闵公元年”条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显而易见,“诸夏”是和“夷蛮戎狄”相对的,指的就是周分封的中原诸国。在这里可以清晰看到“诸夏”不断扩大的过程,亦即春秋时代中原诸国在同夷狄的斗争中

日益增强了以周天子为共主、以姬姓为共同血缘纽带、具有共同责任感的民族认同。因此,春秋时代是华夏民族核心成分形成的时期^①。

实际上,如孔子所言,这种民族认同的最高准则是文化因素,即行周礼。因此,随着周朝制度的普及,“诸夏”的地域也在不断拓展。秦融入“诸夏”并统一中国,也自称为“夏”。《法律答问》记载: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②

秦承周,以“夏”自称,统一全国之后,“夏”也成为统一王朝的称谓。

“华”的含义 “华”与“夏”在指称周朝上同义,两个字有着相同的发展过程。上引《尚书·武成》“华夏蛮貊”句中,“华”和“夏”联用;《左传》“定公十年”条记载:“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夏”和“华”可以互换,意思相同,都是和夷狄相对的称号,指的就是周朝。

“华”本于“花”,引申为华美之意。在人文上,“华”解作“文德”^③。上引孔颖达的解释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章”是礼的表现,因此,“华”也就被赋予了礼的含义。《国语·鲁语上》“季文子论妾马”的韦昭注称:“华,荣华也。”其本文说:“以德荣为国华。”有德而荣华,“华”字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

诸华 周的中原诸侯行周礼,修文德,冕服采章,故称“华”。这类诸侯亦称作“诸华”,《左传》“襄公四年八月”条记载:“魏绛侯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这里的“诸华”与前面的“诸夏”同义。秦汉时代,常见“华夏”连称^④,成为中国的一种称谓。

二、“中国”与“天下”

中国的原义 “中国”一称,首见于西周初期。1963年,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

① 堀敏一《中国与古代東アジア世界——中華の世界と諸民族》,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第17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6页。

③ 《尚书·舜典》“帝舜曰重华”,汉孔安国《传》解释道:“华谓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尧,俱圣明。”《舜典》被视为秦汉时代的伪作,则此条可作为秦汉思想的反映。

④ 《尚书》的《虞夏书》(《舜典》、《禹贡》)、《周书》(如《牧誓》、《武成》、《微子之命》和《周官》等篇)的汉、唐人注疏里,常见“华夏”连称。

土的何尊,为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载:

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辟民。”

铭文中“中或”的“或”,《说文解字》解释道:“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段玉裁注:“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据此可知“或”即“国”。周武王时称“中国”,可以得到证明^①。若再进一步追溯,则殷商卜辞中可以见到商人称其国为“中商”,故胡厚宣先生认为:“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②综合起来看,“中国”称谓最迟已见于周武王时代。

根据何尊铭文,“中国”指的是在商旧地建设的洛邑,为周的直辖地。

《诗经》中也有多处“中国”的记载,例如《大雅·民劳》诗的每一段起始句:

“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速。”

“民亦劳止,汙可小偲。惠此中国,俾民忧泄。”

“民亦劳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其中一段的首句为“民亦劳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同上面的句子,尤其是第一句相对照,即可明白诗句中的“中国”也就是“京师”。故其注解释:“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此外,诸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炁然于中国,斂怨以为德。……内戾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荡之什·荡》)

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大雅·荡之什·桑柔》)

此二处的“中国”,亦为“京师”。和“中国”相对的是“四方”,亦即“诸夏”。不论“中国”指的是镐京还是洛邑,都是周直辖的政治中心地。

“中国”的逐渐扩大 春秋以后,文献里“中国”的称呼大量增多。《左传》记载:

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成公七年正月”条)

① 于省吾《释中国》,收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② 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从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

“戎有中国，谁之咎也。”（“昭公九年”条）

“中国”和“蛮夷”、“戎”相对，已经从原来的“京师”扩大到周王朝的中原封国，故《史记·张仪附犀首传》记载：“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杆。”唐司马贞《索隐》解释“中国”道：“谓山东诸侯齐、魏之大国等。”唐张守节《正义》说：“中国，谓关东六国。无事，不共攻秦。”随着文化统一的进程，“中国”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战国时代，实行周制而获得中原诸侯国认同的国家逐渐融入“中国”，例如西方的秦，南方的吴、越和楚等都先后成为“中国”的一部分^①。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中国”成为全国的称谓，《史记·天官书》记载：“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

然而，以中原为“中国”的观念根深蒂固，影响久远。《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力劝孙权抗魏，说道：“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这里的“中国”指曹魏政权，即中原国家。有趣的是，西晋灭亡后，播迁江南的东晋以正统自居，但是，《晋书·周处附周勰传》在记载北人南渡时说：“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显然，南方一般还是以北方为“中国”，这种情况在南北分裂的时期十分常见。唐朝之后，称北方为“中国”的现象逐渐稀少。

王尔敏先生曾经统计五十三种先秦典籍，发现在二十五种典籍中，共出现“中国”一百七十二次，可以分为五种用法：（1）京师；（2）国境之内；（3）诸夏；（4）中等之国；（5）中央之国^②。这五种用法和上面的分析相对应，可以清楚看出“中国”由京师到诸侯国、最后成为全国称谓的发展过程。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不仅是地域的概念，它和上述“夏”、“华”一样，具有文化的含义。司马迁在论中国同夷狄的区分时说：“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③内外之别，标准在于“冠带”，也就是礼仪制度。更加清楚而具体的表述，见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缪公问由余道：“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亦即在古人心目中，“中国”是“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国家，对于周边民族具有文化上的优越

①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记载：“秦、楚、吴、越，夷狄也。”本书所引正史，均使用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 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台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5卷第8期，1973年，第1—2页。

③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太史公曰”，第1342页。

感。春秋赵武灵王时代,赵公子成曾经用颇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吻对“中国”所蕴含的文化特点概括道:

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①

“天下”的含义 高居于民族和国家之上的是“天”,“明明上天,照临下土”^②。上天通过“天子”来管理小民和国家,故《尚书·召诰》说:“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王代天行政,首先要立德,其统治下的民众才会遵守法度。此句中的“天下”指的是周天子的统治地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条记载了富辰劝谏周襄王的话:

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

周之“天下”,及于所封建的诸侯国,其外则有蛮夷,故周天子要团结诸侯,共御“外侮”。

《尚书·立政》记载:“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尚书正义》引《释地》解释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知‘海表’谓‘夷狄戎蛮,无有不服化者’。”“天下”与“夷狄戎蛮”所居之“海表”对举,显然是周的领地。

然而,圣王应该超越华夏,德被四裔,使得华夷无不靡从。因此,天子之德有如阳光雨露,广被四野。随着德化的进程,天下的范围自然也在逐步扩大。贾谊《过秦论》说:“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春秋战国时代说的“天下”,还只是实行周制的地区,多用于指山东六国。

秦统一中国之后,“天下”的称谓显著增多,从下面引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多条记载,可以看到秦始皇君臣喜欢使用“天下”一词来指新统一的全国,令人感受到秦人对统一六国空前功业的自负。秦始皇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称统一六国为“平定天下”,不是司马

① 《战国策》卷十九《赵二·武灵王平昼闲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56页。

② 《诗经》卷十三《北山之什·小明》。

迁的创造,秦朝君臣都如此言说,《史记·秦始皇本纪》所收秦始皇登泰山碑文称:“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登之罘东观碑文称:“禽灭六王,阡并天下”,皆为明证。

秦之天下,囊括周分封的诸侯国,但实际要更加广袤,故大臣李斯等人无不骄傲地说道: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秦的“天下”远比周广,包括实行郡县制度、法令统一的地区,也就是秦朝政令所及之地。秦二世说:“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在秦政令通行的“天下”外,则是四夷的地区。故此处所言,应是狭义的“天下”。

此外,在秦始皇于琅邪所立碑文中提到“天下”的范围: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这个“天下”的范围,与仆射周青所言相呼应:“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里的“天下”涵盖了夷狄,是广义的“天下”。然而,夷狄地区并非秦实际控制的区域,只表明秦朝的雄心,要让皇帝的威德像阳光一般照耀夷狄之地,让他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这一点且留待下面分析。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所谓的“天下”更加凸显出文化的优越,秦朝广义的“天下”观,继承了向夷狄推行中朝文化以改变他们的理念。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夏”、“华”、“中国”和“天下”都有一个由周天子直辖地逐步扩大到全国的演变过程,它反映出中国的民族、国土和文化等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不断深化和扩展的动态过程。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伴随着各种文明的融合,对民族、国土和文化的认识都在进步和发展。从这些观念中,都可以看到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周边民族只要接受周的礼仪制度,便能够获得周王朝和中原诸侯的承认,逐渐融入其中,成为其一部分。因此,“夏”、“华”、“中国”和“天下”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够柔软地适应时代的变迁。